

PA
E527
902

苏联报刊反华言論 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参考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学习委员会印

9021

苏联报刊反华言論

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荒唐

編者按：两个月前，本报曾发表过一批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自从那个时期以后，他們的反华言論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越来越囂張，越来越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九月一日到十月二十七日，仅仅在苏联中央一級的报刊上发表的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評論、文章和其他形式的材料，就有四百三十篇。加上从七月十五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发表的二百八十六篇，总共是七百一十六篇。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苏联报刊轉載的其他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決議和文章在內。

苏联报刊最近期間反华言論所採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社論、編輯部文章、論文直到小品文、漫画、讀者来信，无所不用。他們的論点更加荒謬无稽，更加不像样子，除了謾罵还是謾罵，除了造謠还是造謠。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更加恶毒，更加粗野。他們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的伟大領袖毛澤东同志，攻击毛澤东同志所闡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設的路綫，攻击中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他們說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兄弟党表現了“父道主义”，採取“分裂綱領”；中共的意識形态“同托洛茨基的概念相吻合”；中国是“好战的主观主义”；中国“沉醉于渴望取得霸权”；“中国政治家有一句口号：‘打倒白人！’”；他們甚至謾罵“北京叛徒”，“像是放肆的决斗者”，“中国領導人的良心就如污水一样”，等等，等等。

这些反华的奇文，写得实在蹩脚，制造的謠言实在离奇，讀来令人生厌。但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难得的反面教材。我們劝讀者同志們、朋友們，还是耐心地看下去，把它研究一番，总会从这些反面材料中得到益处的。

本报在刊登苏联报刊的反华言論方面，从来不惜篇幅，不取分文。无奈此种文章层出不穷，又臭又长，我們的篇幅毕竟有限。为了使苏联报刊的反华奇文不致湮沒，准备另外編成专集出版。在报纸上，只能陸續刊登这些文章的摘要。下面，就是最近一个时期苏联报刊反华言論的摘要。

攻击我国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設方針 污蔑中国社会主义建設的路綫

《苏維埃俄罗斯报》十月十日发表格拉宁的題为《共同合力还是单干》的文章說：

“‘自力更生’会延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北京理論家的方針不但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主义利益是有害的，对中国人民自己也是有害的。”

“中国主席刘少奇不久前說，国际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不能成为反对自力更生的借口，……为什么要拼命地加以反对呢？’”

“不是別人、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自己六月十四日信中公开以‘自力更生’政策来同兄弟党共同制定的国际劳动分工路綫相对抗。”“試問，如果中国领导人否认这两者之間的矛盾，那他們为什么‘那样卖力’地反对国际劳动分工。为什么要用駭人听聞的攻击来反对苏联呢？中国分裂者不但攻击自己理論上的对手，而且誹謗社会主义——消灭了一切剝削的社会制度，这种誹謗是只有共产主义最疯狂的敌人才作得出的。”

《劳动报》九月十三日发表庫德羅夫的題为《主要影响》的文章說：

“有这样的‘理論家’，他們把共产主义看作某种禁欲主义的組織，那里将沒有完全富裕的位子，而所有的人将‘平均’分担不幸和灾难，例如中国教条主义者歪曲地描繪并庸俗了苏共对苏联經濟的增长和提高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关心，他們认为把經濟問題放在前位是不正确的，指責我們为‘經濟主义’，忘記了革命的‘真正’目的。”

“中国教条主义者說，‘經濟主义’以及同資本主义的和平竞赛意味着放弃階級斗争，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沒有比这种观点更为錯誤的了。”

“中国领导人的特点，不仅在低估經濟問題上，而且在經濟領導的原則上脫离了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領導国民經濟的最重要的列宁主义原則，是吸引广大劳动群众来管理生产，在科学的基础上作出計劃和經營的决定。中国领导人使用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运用的方法，在經濟政策方面广泛地采用了‘意志’的手段，也就是忽視經濟法則的行政領導方法，并把它作为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

《东方真理报》九月二十七日发表扎汉基羅夫的題为《他們的方針是有害的》的文章說：

“中国所謂的‘大跃进’政策是建筑在忽視客觀的經濟規律、輕視人的基础上的，人被认为只不过是一架大国家机器上的螺絲釘。”

“派遣苏联专家的条件迫使苏联政府决定，从中国撤回专家，使已經开始的大事业半途而废。数十个工厂落得沒有有經驗的干部，許多工程停頓了下来。摆脱了剝削者、外国垄断組織的統治的国家、具有一切前提迅速发展經濟的国家，大大地降低了經濟增长的速度、經受着沉重的經濟危机。这就是中国领导人发明的‘經濟規律’导致的結果，这就是輕視普通人的需要和疾苦所导致的結果。”

《劳动报》十月十一日发表加夫里罗夫的題为《兄弟互助的成果》的文章說：

“有一些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的人反对扩大社会主义各国的經濟联系和兄弟互助。这是指北京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他們來說，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不是別的，而是‘资产階級經濟关系的复制’，他們认为每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應該‘首先用自己的力量’，这实际上是建立經濟上閉門自守的独特的民族經濟。不久前还付出不少力量来尽可能多地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援助的领导人竟然进行这种鼓吹！現在，得到了广泛援助后，他們却千方百計糟

踢这种援助，用‘經濟独裁’的誹謗来責难我国。中国领导人在自己的經濟建設中犯了許多錯誤后，又用‘自力更生’的‘理論’加深这些錯誤……”

攻击中共领导人的言論和著作 污蔑中国人民的伟大領袖毛主席

《共产党人》第十五期发表题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基础》的編輯部文章說：

“中国人士在其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还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問題摊了出来，并试图重新把这个問題作为普遍辯論的对象。”

“中国人士断言，进行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就意味着丑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看来，他們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个人迷信所特有的方法的总和，即恰恰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

“中国领导人反对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言行，是反对集体领导方法的进军，是号召支持中国宣传机关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的神化毛泽东的做法。若干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和在中国人

民的广大阶层中积极进行着这种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說教。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以‘毛泽东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企图。”

“誠然，現在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公开反对列宁主义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已經在全世界，其中包括在中国，成了千百万群众的旗帜。因此，誰要是公开地攻击列宁主义，就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脫离广大群众。正因为如此，中国活动家在口头上发誓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中他們却企图用所謂民族的、或者‘民族化的’、‘中国化的’馬克思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普遍的国际性质。”

《新时代》第四十一期发表署名“現代人”的题为《个人迷信的辯護士》的文章說：

“要解释苏共和中共领导人在个人迷信問題上的分歧，其原因不应当从往事中寻找，而应当从目前的事件中寻找，也許，应当从北京的某种未来的計劃中寻找。”

“在斯大林和党、国家、人民之間划上等号，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功績和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这恰恰就意味着表現个人迷信的思想。这也恰恰意味着承认领导人、領袖具有某种超人的、非凡的品

质，同时貶低劳动群众的作用，否认正是他們才是历史的創造者，正是他們推动历史前进。而在《人民日报》和《紅旗》的文章中，問題正是这样提出来的。”

“看来，中国领导人起来保护被苏联人民、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譴責的个人迷信，是有其国内政治原由的。問題在于：在北京的思想和实践中，同斯大林的坏思想与坏做法有共同之处的东西太多了。人們很早就看到，北京並沒有消除，而且害怕消除个人迷信所固有的那些制度。那里沒有对国家生活民主化表現真正的关心，連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字眼的本身也受到了怀疑，在中国最近的各种文件中令人奇怪地沒有这样的字眼。中国领导人醉心于建立庞大的国家机构，特别是强制机构，这也不是不受到注意的。”

“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一事实：中国宣传机构尽力圍繞北京的某一个人制造他‘正确’、‘英明’和‘无所不能’的声望。这种声望与其說适用于新中国的建設者，不如說更适用于旧中国的某个皇帝。”

“他們保护斯大林不受批評，粉飾和頌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企图使他們自己今天的做法不受批

評，頌揚自己今天的做法。”

“十分遺憾的是，正是在这种做法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那些特征。这首先就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情緒的猖獗，而这些情緒采取了最意想不到的形式。这里还美化中国过去的历史，竟然到了崇拜像成吉思汗这样的‘英雄’的地步。这里对远在許多世紀以前的各种領土問題和領土要求，有着非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所有的那种过分的注意，热中于边境爭端，不惜同友好的邻邦发生武装冲突。这里还有病态地、与伟大中国革命不相称地斤斤計較‘威信’。为了这种‘威信’，正在牺牲着中国和其他各国人民的真正重要利益。”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綫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綱領》的編輯部文章說：

“只好这样設想：要么是几年以前，要么是在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中，中国领导人是不誠懇的和沒有原則性的。

“他們給自己提出了一个不体面的任务：为斯大林的錯誤、歪风、甚至犯罪行为辯解，实际上把个人迷信所产生的可耻現象說成是社会主义的一般

規律，是无产階級专政的不可分割的特征。不能不看到，問題的这种提法只能敗坏无产階級专政思想的名声，在全世界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破坏社会主义理想的吸引力。”

《消息报》十月十一日发表弗兰采夫的题为《北京理論家們的糊塗論断》的文章說：

“我們坦率地說，中国领导人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談。”

“要想夺取政权，就得已經有强大的軍隊嗎？然而要知道，列宁曾說過直接相反的論点，而历史也是符合这种論点的。”

“所以，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武装起义被設想成依靠‘强大軍隊’的軍事政变。但是，十月革命是武装的工人和赤卫軍实现的，苏維埃政权当时沒有强大的軍隊，也不可能有强大的軍隊。毛泽东写道：‘从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說的观点看来，軍隊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五三五頁）这里，他忘記說，无产階級应当首先打破国家政权机器，而不是簡單地掌握它，利用它。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这样做。无产階級只在随后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的新机器。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武装起义等于軍事政变和战

爭。”

“毛泽东把革命和战争混为一谈，并作出如下的結論：‘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掌握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文版第五三五頁）不言而喻，这个‘真理’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指出的。”

“这一切表明，企图把革命理論建立在这个或那个政治家的名言上，把这些名言当作发现了新規律，并把它們与馬克思的《資本論》或者列宁的經濟、社会和哲学著作等量齐观，这是多么危險。这些名言正在人們的意識中慢慢地排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人們正在习惯于这种偷換。长此下去不确切的东西就会越积越多，在流行的个别名言和准确的、有深刻科学根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之間的差別就会越来越大。北京理論家們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还挖空心思地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系統化，人为地把它变成理論出发点，排挤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所闡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对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贗品。”

《烏克蘭真理报》十月十六日发表科佐沃伊的題为《比一切大喊大叫的人喊得还高》的文章說：

“中国教条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理論和实践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妄挑战，是对其原則的歪曲和否定。”

“北京現在醉心于‘中国化的馬克思主义’的說法，甚至采用了‘毛泽东主义’的術語。”

《消息报》十月十日发表庫德里雅夫采夫的題为《統一行列中的非洲》的文章說：

“中国领导人力图使亚非人民的斗争同欧美国国家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的斗争分开，这表现在他們企图建立孤立的泛亚非的記者、工会、妇女、青年組織上。这种立場同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散发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臭味。中国称这个論断是‘誹謗’，全力想証明，正是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国际主义者。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的民族主义調子不是今天才出現的，而有十分深的根源。”

“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七年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信（刊登在《美国和亚洲》杂志六月号）中写道‘毛泽东的伟大功績在于他把馬克思主义从欧洲的形式改造成亚洲的形式。馬克思和列宁是欧洲人，他們用欧洲語言写欧洲的历史著作，研究了欧洲問題；他們很少涉及亚洲或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創造了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或者說亚

洲形式……东南亚其他国家有类似条件。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影响所有这些国家。’ ”

“刘少奇同志的信中不是从国际主义立場而是从民族主义立場来論述馬列主义，因为在信中斷言，仿佛存在着的不是馬列主义的統一学說，而是这一学說的某些形式，包括某种‘亚洲的’形式。这岂不是企图利用馬列主义奠基人的国际主义学說来满足民族主义的需求，其差别只在于現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奢望比一九四七年在地理上扩大了，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东南亚了。”

“对馬列主义学說的这种民族主义論述当时沒受到中共内部的反击，如今产生着恶果了。”

《苏維埃吉尔吉斯报》十月六日发表卡热克巴耶夫的題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强大的武器》的文章說：

“中共领导人口头上鼓吹列宁主义，事实上却禁止传播伟大列宁的思想，而馬列主义的科学正在被毛泽东‘学說’所暗中代替。在中国，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系統研究是沒有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許多著作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版过。而如果发表一些个别著作的話，它們的发行額也超不过五万份。而中国却有一千八百万党员和預

备党员。而注释，据说是多余的。”

《红星报》十月五日发表题为《没有根据的指责和诽谤》的文章说：

“在北京，……国庆之日依然成了中国领导人发表新的、不能允许的言论的机会。例如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坚决反对少数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支配所有的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主义。’”

（人民日报编者注，此段引语和原文有出入）

文章说：这是一种诽谤性的言论，其目的就是要公开地把上述与苏联的政策完全无关的罪名归咎于苏联，从而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放在一起。

說中国奉行帝国主义的

“战争边缘”政策

主张在核战争中“牺牲全人类的一半”

《共产党人》第十四期发表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和中国领导的分裂纲领》的编辑部文章说：

“中国领导人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发展世界革命过程的条件和手段的问题上，采取了反列宁

主义的立場。不仅如此，他們还竭尽一切可能来丑化爭取和平的斗争，攻击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緩和‘冷战’和国际紧张局势，旨在通过談判解决爭端的每一項措施。

“对中国领导人近三年多以来的言論加以分析，就可以說明他們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論据的某种演变。最初，他們不太注意利用一些关于和平及和平共处的好处的抽象議論来掩盖他們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場相背离的观点，他們比較露骨地談出这种观点。后来，大概是由于意識到自己的观点靠不住，他們便越来越多地說他們也拥护和平，也承认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則。

“但是，他們的观点在这几年里实质上並沒有改变。……

“苏联人与全体进步人类一道把締結禁止核試驗条約看作和平共处政策的巨大胜利，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仅仅是第一步，今后还要为巩固胜利，为进而禁止地下核試驗，为普遍彻底裁軍頑强地进行斗争。正是因为这样，他們才坚决地駁斥站在‘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立場上指責这个条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实际生活告訴我們，

裁軍問題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決，因此向前邁進一步總比踏步不前或者倒退好。袖手等待一舉解決全部重要國際問題的時間到來，這在殺人武器充斥世界的條件下就是對人类的犯罪行為。……”

“可見，中國領導人在當代的任何重要問題上都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綫進行了篡改，都背棄了他們簽過字的文件。”

“中國領導的立場是什麼呢？如果它聲稱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對比根本改變了，而又馬上斷言戰爭仍然不可避免，那末自然就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它不排斥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率先發動的各國之間的‘革命戰爭’。要知道，任何一個理智的人都把中國領導人關於戰爭不可避免的論點，同他們的關於‘和平共處不能當作社會主義國家的總政策’的論點聯繫起來。他們的《列寧主義萬歲》文集的一個有名論點很不光彩地傳遍了全世界。這個論點說，由於戰爭而‘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

“借助於世界大戰而在其他國家搞革命，這是共產黨人出於原則性考慮而不能接受的道路，因為